

# 藏传佛教艺术史研究新趋向 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王传播

**内容摘要：**2018年4月28-29日，藏传佛教艺术史研究新趋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哈佛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在哈佛大学访学的三名中国学者召集组织，得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亦提供了赞助。会议邀请到了20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表大会发言，就藏传佛教艺术史研究的六个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开展多学科互动、新研究分享，系首次在哈佛大学召开有关西藏艺术史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

2018年4月28-29日，由哈佛燕京学社主办、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协办的藏传佛教艺术史研究新趋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哈佛大学召开，来自美、中、日、奥地利等国家和地区的2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会议报告20篇，覆盖藏传佛教美术、佛教建筑、汉藏文化交流、西藏考古新发现等多个领域。此次会议由哈佛燕京学社2017-18年度合作研究员张长虹（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访问学者廖畅（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和访问生王传播（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博士生）召集和组织，得到哈佛大学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教授范德康（Prof.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艺术与建筑史系 Abby Aldrich Rockefeller 亚洲艺术教授汪悦进（Prof. Eugene Y. Wang）和 Gardner Cowles 南亚艺术副教授金珍我（Prof. Jinah Kim）的积极响应与支持

并担任会议的学术主持。

会议伊始，哈佛大学汪悦进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发言致辞并宣布会议开幕。此次学术会议共设有六个议题：一，《金刚鬘》与佛教图像志研究 (Studies on the Vajrāvalī and Buddhist Iconography)；二，汉藏佛教艺术研究 (Sino-Tibetan Art)；三，西藏西部艺术与佛塔空间解读 (Art in Western Tibet and Reading the Stupa Space)；四，藏传佛教美术中的世间代理人 (Human Agents of Tibetan Buddhist Art)；五，西藏艺术的风格与装饰 (Styles and Ornaments of Tibetan Art)；六，新发现与新方向 (New Findings and New Directions)。下面笔者按议题内容分别加以评述。

## 一、图像志研究

图像与文本的比对研究，是佛教艺术史研究的基础方法，通过释读文献材料以解析物质遗存，并试图发现新的研究问题，这在密教美术研究上落实的尤为突出。由活跃于12世纪的印度祖师无畏生护 (Abhayākara Gupta) 汇编的《金刚鬘》(རྫོག་རྩེ་འབྲིང་གི་Vajrāvalī) 一书对藏传密教仪轨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次会议有三篇报告探讨了此密教图像学经典在藏地的发展与应用。

金泽大学森雅秀教授注意到《那塘五百佛像》中收录的《金刚鬘》在曼荼罗数量及排序上的特殊性，他通过对俄尔寺藏金刚鬘、波士顿美术馆藏金刚鬘唐卡等相关材料的比对研究，归纳了《金刚鬘》图像传承在西藏的多样性发展。哈佛大学金珍我教授对金刚鬘图像的考察更偏重金刚乘佛教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对复杂图像系统加以综合汇编的现象，她以俄尔寺藏金刚鬘系列唐卡为出发点，探讨插图经书是如何转化为有效的视觉媒材，来推广《金刚鬘》中将密教仪轨的体系化汇编的做法。台北故宫博物院锺子寅博士的报告追溯了金刚鬘在安多地区的传播，他透过对青海瞿县寺诸佛殿的尊神图像配置的考察，发现宝光殿、万岁殿、隆国殿的图像内容与金刚鬘关系密切，认为金刚鬘在明初就已经传入安多地区，而这与该寺第二任堪布贝丹桑布 (དབལ་ལྷན་འབྲེལ་པོ་) 与五世噶玛

巴得银协巴（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 1384–1415）1409 年在南京的交流有直接关系<sup>1</sup>。

专注于密教曼荼罗研究的日本著名学者田中公明在报告中介绍了他自 2013 年以来辨识的诸多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曼荼罗唐卡，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唐卡与原初文本环境的联系遭到了割裂，通过他的研究试图重建那些丢失的仪轨传承和作品序列<sup>2</sup>。

除曼荼罗之外，图文结合的研究方法也同样应用在了诸多绘画题材中，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廖昉研究员对一件 12–13 世纪的早期达隆噶举唐卡进行了深入的图像学解读，她认为此唐卡是对菩提场陀罗尼经（*Bodhimaṇḍālamkāra*）的再现，而这也是目前所知的藏传佛教美术中唯一一件该题材的艺术作品，并进一步对尊像配置、图像中的身语意聚合等问题进行了讨论<sup>3</sup>。耶鲁大学安德鲁·昆特曼教授和弗吉尼亚大学柯蒂斯·谢夫教授汇报了两家单位合作展开的“佛传”数字化项目（成果可见 [www.lifeofthebuddha.org](http://www.lifeofthebuddha.org)），他们将多罗那他（*Tāranātha*）所作指导绘制佛传故事的经典《敬信曜日》（དང་བའི་ཉིན་ལྷོད）与彭措林寺大殿二层回廊的佛传壁画结合，以图文对照的方式展现此经典是如何落实在二层回廊壁画绘制中的<sup>4</sup>。

## 二、汉藏艺术交流

汉藏文化艺术的交流与汇通是藏传佛教艺术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也是国际学界的研究热点。本次会议共有三篇报告聚焦于汉藏佛教艺术的互动，分别是 1. 黄阳兴：

- 1 这几位代表发言的题目分别为：Mori Masahide: A Study of the *Rdor 'phreng* Part of the Five Hundred Deities of *Snar thang*（森雅秀：《那塘五百佛像》中《金刚鬘》部分的研究）；Jinah Kim: Compiling Visions in Color: *Ngor Vajrāvalī* Series and its Indic Root（金珍我：以色相编结幻象——俄尔寺金刚鬘组画及其印度根源）；Eric Tzu-yin Chung: The Fifth Karmapa and the Visual Evidence of the *Vajrāvalī* (Rdo rje 'phreng ba) in Early-Ming Amdo（锺子寅：明初安多金刚鬘图像与五世噶玛巴），该作者关于该问题的研究还可参见锺子寅：《重探青海瞿县寺之瞿县殿（二）：藏传佛教〈金刚鬘〉教法在明初安多地区传播的新发现》，载《故宫学术季刊》第 32 卷第四期，2015：143-218。
- 2 Kimiaki Tanaka: *Maṇḍala Sets Newly Identified since 2013*（田中公明：2013 年以来新辨识的曼荼罗组画）。该作者近年关于曼荼罗的研究还可参见 Kimiaki Tanaka, *Mitrayogin's 108 Maṇḍalas: An Image Database*, Kathmandu: Vajra Books, 2013.
- 3 Liao Yang: An Iconographical Study on an Early \**Bodhimaṇḍālamkāra* Thangka（廖昉：一件菩提场陀罗尼经早期唐卡的图像研究）。廖昉研究员在《藏传佛教后宏早期绘画的一种形式构成与过渡特征》（《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6）：15-37）中针对该幅唐卡构图所展现的身语意聚合的意蕴有专门讨论。
- 4 Andrew Quintman & Kurtis R. Schaeffer: *Painting Manuals as Intermediary Texts: Examples from Tāranātha's Life of the Buddha*（昆特曼、谢夫：壁画作为中介文本——多罗那他《佛传》实例）。他们关于该主题的合作研究还可参见：Andrew Quintman & Kurtis R. Schaeffer, "The Life of the Buddha at Rtag brtan Phun tshogs gling Monastery in Text, Image, and Institution: A Preliminary Overview."《藏学学刊》第 13 辑，2015：32-73。

汉藏融合——元代景德镇清白瓷塑与藏传佛教艺术管窥；2. 王跃工：帝王的供养——乾隆时期宫廷造像类型考；3. 周文欣：双重智慧——清廷的帝王与喇嘛画像。三篇报告分别从陶瓷、塑像与绘画三种媒材出发，研究西藏艺术在汉地不同时期的发展形态。

深圳博物馆黄阳兴博士基于对元代景德镇窑烧造的一批青白釉瓷佛像的风格分析，探讨佛教瓷塑艺术中兴起的汉藏融合的艺术新风。故宫博物院王跃工研究员系统整理了乾隆时期宫廷造像文物，以风格为线索，排定出乾隆时期宫廷造像的类型，全面展示了乾隆时期宫廷造像的多元面貌，这对客观认识乾隆皇帝本人的审美取向以及18世纪宫廷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纽约亨特学院周文欣博士通过对清官藏乾隆皇帝、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和六世班禅洛桑班丹益希的画像考察，发现帝王与僧侣的身份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汇通与融合，由此去理解这些人物在当时所扮演的角色，并透过此视角提供对以上人物身份与关系的新的思考方向<sup>5</sup>。

### 三、西藏西部的建筑与艺术

喜马拉雅西部地区作为后弘期上路弘法的核心区域，保留了大量早期佛寺建筑与文物，一直以来都是国际学界的关注焦点。本次会议共有三篇报告与西藏西部地区艺术相关。

维也纳大学金伯格教授，在其报告“谁主沉浮——古格佛教僧团的形成”（*Those Who Lost, and Those Who Won: the Formation of a Buddhist Community in Guge*）中，通过对塔波寺不同历史阶段的题记与图像的比对研究，重溯了该寺建立之初的组织情况和社会环境，认为在经历了11世纪早期的一次僧团剧变后，该寺在1042年左右全面革新，而塔波寺初期的组织变化对于我们把握西藏西部佛教的复兴运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信息。格拉茨技术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ät Graz*）的柯齐茨博士（*Gerald Kozicz*）的报告“阿契寺大入门塔——全景重建的尝试”（*The “Great Entrance Stupa” of Alchi: An Attempt to Reconstruct the Full Picture*）聚焦于阿齐寺大入门塔内的空间结构，以及天顶曼荼罗与该塔建筑空间之间的关联，他从建筑学和图像学的角度分析了入门塔内空间所呈现的对称感与层次秩序，认为这种建筑结构应是从拉达克当地的“译师塔”建筑类型发展而来，并基于塔内图像细节探讨该塔在整个阿齐寺内的功能意义。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博士生王传播在其报告“居庸关过街塔的图像配置与空间秩序”中，基

5 该文现已正式发表，见 Chou Wenshing, “Bodhisattva Emperors of the Manchu Qing Dynasty.” In Karl Debreczeny ed., *Faith and Empire: Art and Politics in Tibetan Buddhism*, New York: Rubin Museum of Art, 2019: 191-211.

于对居庸关过街塔内图像的分析,对藏汉过街塔内图像程序的空间结构作出了新的解读。他从居庸关过街塔券顶的五铺曼荼罗的配置逻辑入手,结合喜马拉雅西部地区的早期过街塔遗存,构建了藏式过街塔内图像的基本组织模型,并基于此来分析居庸关过街塔内图像系统对此种模型的调整理路<sup>6</sup>。

#### 四、藏传佛教美术中的世间代理人

在研究藏传佛教美术时,我们的视角除了要关注画面内部的与佛教义理认识相关的宗教信息外,还要注意画面外部的历史信息。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林瑞宾(Robert N. Linrothe)在其报告“规定还是实践?西藏绘画艺术赞助人的印度习惯”(Prescription or Practice? Indian Conventions for Sponsors of Art in Tibetan Painting)中追溯了西藏早期绘画中在画面底部边角表现供养人的现象,他通过对早期东印度造像与西藏绘画之间关联的思考,认为西藏绘画中的供养人传统是受印度影响的典型案例,相较于续部经典中的文本规定来说,进入西藏的东印度艺术家和艺术品对于形成西藏绘画的这一传统有着更重要的意义。纽约鲁宾艺术博物馆(Rubin Museum of Art)高级策展人杜凯鹤(Karl Debreczeny)的报告“1292年的大黑天造像施主再考”对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的一件断代为1292年的大黑天造像的供养人作出了新的解读,他认为此造像背面所刻写的施主“A tsara Bag shi”是指臧巴国师(འཇམ་པ་གུན་དགའ་གཤམ་པལ། 1230-1303年),并基于臧巴国师传记中的相关信息讨论这件造像的年代以及建造意义。西藏博物馆巴桑罗布研究员在其报告“萨迦寺藏绢画佛祖唐卡试考”中介绍了一幅萨迦寺藏的释迦牟尼佛绢画唐卡,他根据该唐卡的题记及勉拉顿珠传记等材料确定此唐卡为勉拉顿珠真迹,属于释迦牟尼佛及十六尊者系列唐卡之主唐,而画面下方的供养人为勉拉顿珠与钦孜大师的师父朵巴·扎杰。

#### 五、风格与装饰

对风格样式的分析与定义是艺术史研究中的重要部分。纽约喜马拉雅艺术资源中心

6 王传播针对喜马拉雅西部地区的过街塔图像空间的讨论可见,王传播:《套叠的灵塔:阿齐寺一号过街塔的空间意蕴与图像程序》,《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7):58-66;《拉达克芒域村2号过街塔内绘塑研究》,《西藏大学学报》2019(3):68-79。

主任杰夫·瓦特 (Jeff Watt) 在报告“西藏绘画风格的再定义”中思考了西藏艺术风格的研究理论,他注意到不同语言对“风格”的定义与概念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西藏艺术史研究需要摒除不清含混的术语,应基于常识、现实因素和明确的风格特征描述来建立一种新的方式理解西藏绘画的风格问题。林静云博士 (Nancy G. Lin) 在其报告“此世界之庄严” (Ornaments of this World) 中,从五世达赖喇嘛灵塔的装饰要素,展开了一项针对 17 至 18 世纪西藏宫廷文化中的装饰概念及其应用的考察。

## 六、新发现与新解读

考古发掘的新成果历来备受关注。近年来,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与发掘,在川青藏三省交接地区发现了诸多吐蕃时期摩崖石刻遗存,为藏传佛教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思考方向。

四川大学历史学院霍巍教授根据对藏东地区的吐蕃摩崖石刻题记的考订,发现多处造像皆由吐蕃高僧益西央及其团队所刻,而这批造像的时代背景应与唐代著名的长庆会盟有密切联系,推测这批造像很可能是唐蕃交流史中围绕一次会盟而展开的宗教活动所遗存下来的材料<sup>7</sup>。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长虹聚焦于藏东摩崖石刻的题记与图像释读,她对赞普的头光、大日如来的赞普式服饰特征等图像特征加以分析,并结合题记中出现的“菩萨赞普”一词和其他与佛教有关的题记,从考古实物材料出发讨论了吐蕃中晚期佛教与王权的关系<sup>8</sup>。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博士生朱德涛在报告中介绍了青海玉树称多县新发现的摩崖石刻,从图像与题记两方面出发对这批材料作了全面解读,他认为这批造像呈现的风格特征与前弘期藏东地区的摩崖石刻非常接近,并对题记中出现的与萨迦派相关的纪年方式加以追溯,认为这批造像或与多康地区著名的茹拉 (རུ་ར) 家族有关<sup>9</sup>。

此次会议,不仅公布诸多重要的新材料,更难能可贵的是还在研究方法 with 理论视野等维度给予了藏传佛教美术研究以有价值的分享与探讨,现不揣简陋,简要总结如下:

7 霍巍教授近年的研究可参见霍巍:《藏东吐蕃佛教摩崖造像背景初探》,《民族研究》2015 (5): 92-101;《论藏东吐蕃摩崖造像与吐蕃高僧益西央》,《西藏大学学报》2015 (6): 63-69;《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的考古调查与新发现》,《青海民族研究》2017 (1): 4-9;《唐蕃会盟与吐蕃佛教》,《世界宗教研究》2017 (1): 57-72;《藏东吐蕃摩崖造像与唐蕃交流视野下的剑南益州》,《藏学学刊》第 16 辑,2017: 301-313。

8 作者对藏东吐蕃时期佛教石刻的研究还可参见:张长虹:《藏东地区吐蕃时期大日如来图像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7 (1): 14-20 以及本辑刊发的《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佛教石刻调查简报》。

9 该文正式发表于朱德涛、蔡林海:《青海称多县歇武镇格日村宋代佛教摩崖石刻考古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 16 辑,2017: 164-182。

1. 对同一研究主题不同视角的观察使藏传佛教美术研究脱离粗线条、大框架的概念性讨论，会帮助我们得出更加丰满而精致的理论认识。针对《金刚鬘》的三篇主题报告即为我们呈现了这种可能性，三位学者分别从宗教学、艺术史与历史学的不同侧重出发，解构了该图像题材在流传过程中呈现的多重价值。这便引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同一视觉材料对于不同历史阶段与社会人群的不同意义，那么在佛教美术研究中即要有意识地界定物质材料背后的目标人群，并加以明确分类、分层，这样才能使对图像的探讨更加深入、细腻而有的放矢。

2. 基于佛教美术遗存，观察汉藏文化交流之议题是重要的研究面向。三位学者分别从皇室艺术风格与帝王身份认同两个层面分析了西藏与内地的文化互通。黄阳兴博士与王跃工研究员的报告从皇室艺术风格层面探索了汉藏融合的历史现象；而周文欣博士的报告通过对乾隆皇帝与高层僧侣的画像的分析与比对，从图像角度探索了藏传佛教信仰对乾隆皇帝的自我身份认知的塑造，由此呈现了一个新的角度观察民族交流之历史议题。有意思的是，三位学者都是从皇室层面构建藏传佛教及艺术与中原汉地的影响互通。正如上文所指，文化交流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弥散于不同社会阶层之中，皇室生活中的西藏因素构成此讨论的重要侧面，但也易使汉藏汇通这一文化议题，落入帝王将相的政治意图之理论窠臼。故而，藏地文化对汉地中原中下阶层民众生活的影响、及其接受态度，当是我们透过文物材料，观察藏汉文化交互历史的另一重要侧面，这也会使此议题的讨论落实得更为立体丰满。

会议最后，哈佛大学南亚系主任范德康教授做了大会总结发言，对学者们的演讲作了精彩点评。

此次学术会议除了得到哈佛燕京学社、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哈佛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等单位的鼎力支持外，还特邀哈佛大学南亚系博士研究生尹筱天、神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思乔担任会议的口译，她们杰出的多种语言能力和流畅精准的翻译为会议增色不少，受到了参会代表们的高度评价。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项目协调员 Francesca Coppola 亦为会议的组织召开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

◆ 王传播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藏传佛教艺术史研究新趋向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图集





